

# 凤阳方志考

王 剑 英

凤阳在春秋时为钟离子国，汉置钟离县，东晋南北朝置钟离郡，隋唐为濠州治，五代、宋、元相沿未改。钟离阻淮带山，古称天险；濠州襟带淮濠，素为重镇。由于《图经》《濠梁古迹》《濠梁志》均已失佚，除尚存一些诗文外，已看不到有关古钟离和濠州的专志了。

凤阳为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和“龙飞之地”。吴元年升濠州为临濠府，洪武二年诏以临濠为中都，立宗庙社稷，建城池宫阙。又复改钟离县为临淮县，析临淮县置凤阳县，改临濠府为凤阳府，移治新城。清乾隆十九年，又裁临淮县，并入凤阳县。明清时记载中都、凤阳、临淮的府志、县志写过不少，但有些已失传，有的亦已成了海内珍本、残本。《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等仅载一二，《光绪凤阳府志》〔艺文考·载籍〕缺略甚多，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仅载尚存之籍，都不能看到全貌。

这篇《凤阳方志考》，主要是把所知有关凤阳的方志，逐一简单作些介绍：

## 一、《图经》 佚

张国淦《中国古代方志考》第293—294页：《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八〔濠州·定远县·晋献公冢〕引《图经》一条；《輿地纪胜》卷五十〔濠州·景物上·濠水〕引《图经》一条。核对原书，所见北京图书馆藏宋抄本、清抄本及道光惧盈斋本《輿地纪胜》均阙卷五十。

## 二、《濠梁古迹》一卷 佚

宋濂《游荆涂二山记》记叙伴同太子标游览山川途中，收到明太祖寄给他的《濠梁古迹》一卷，“寰翰题其外，令其搜访，与青宫言之”。

## 三、张季樗《濠梁志》三卷 佚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濠梁志》三卷，郡守永嘉张季樗撰。时嘉泰初元。”祝穆《方輿胜览》卷四十八〔淮西路·濠州〕：“郡名曰濠梁，张延卿自知光州，与商廷昌易濠州，后改知和州。开禧兵衅起，罢归。此志即其在濠州时所撰也。”嘉泰为南宋后期宋宁宗年号，初元为公元1201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三十二、《温州经籍志》卷十亦均载录。《濠梁志》是最早见于著录的凤阳方志。

蒋其昌《重修临淮县志后序》说：“《濠梁志》三卷，尚已，宋以后无闻焉”。考马端临进《文献通考》在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宋亡已四十年，但《经籍考》系条据南宋时所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詮校而志之”，因此，虽著录《濠梁志》三卷，仍不能

断定元时存佚。明景泰中修《寰宇通志》引用书目无《濠梁志》，成化中柳瑛撰《中都志·小序》云《濠梁志》已“不存”。因此，《濠梁志》到明时确已失佚。《中都志》钟乳山、临淮山（浮山）、临淮城、三牛城、梦蝶坊等条所引《濠梁志》，当自它书转录，然查祝穆《方輿胜览》卷四十八〔淮西路·濠州〕，并无引《濠梁志》，仅〔郡名·濠梁〕引“郡志”，〔形势〕“阻淮带山”引“郡县志”，不知“郡志”是否即《濠梁志》。

《中都志》《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凤阳府引文有“旧志”及“新志”之称。考《中都志》〔万岁山〕条，〔郭子兴〕条引“新志”文，与《寰宇通志》〔万岁山〕条，〔滁阳王墓〕文相合，因此，“新志”即指《寰宇通志》，“旧志”当是《濠梁志》。

#### 四、柳瑛《中都志》十卷

柳瑛，临淮人，字廷玉，天顺元年进士，官至河南按察僉事，著有《皇明大礼》。《中都志》卷七高宗本《送僉宪柳公廷玉考绩诗序》，卷五〔临淮县人才〕，康熙《凤阳府志》卷四十章钦文《柳团山先生传》均有事略。

柳瑛《中都志·后跋》：“是书之编，始于天顺戊寅，讫于成化丁未，凡六贻稿矣。成化中，……屡欲刊行而弗果。弘治元年戊申（1488），……命工锓梓。……潜心三十年，而成书于一旦。”

《中都志》记叙明凤阳府及所属四州十四县，实为凤阳府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此志不曰凤阳，而曰中都，用太祖制也。”

《中都志》共十卷，分四十五目，《总目提要》认为“体例庞杂，最为冗滥”。总观全书，材料的选择取舍，文字的叙述评论，颇费斟酌，极为谨慎，言简意赅，并无冗词滥文，是一部修得很好的方志。目虽未加归类分篇，销嫌烦琐，编次仍井然有序，无伤大雅。《总目提要》仅此一句评语，未免以偏盖全。康熙时，凤阳知府章钦文以

修纂府志为已任,撰《柳团山先生传》,说柳瑛成进士的第二年,就开始编撰《中都志》,穷年累月,口吟手披,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凡六易稿,而书始成。现续修郡志,“世之相去几二百余年,微先生为指南,几依仗乎其无所之矣”;又作《题中都志》:“作述非容易,难凭秃管删,寥寥百载后,谁似柳团山。”(载康熙《凤阳府志》卷三十五艺文)章钦文对柳瑛出自肺腑的忻慕之情,是亲切而公正的。

《中都志》与一般方志相比较,最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初营建中都的情况。如〔建置沿革〕有定中都、立宗社、建宫室、筑新城及置凤阳府、凤阳县的记载,〔郡名〕有中立、凤阳的命名和释名,〔都城山川〕有万岁山、日精峰,月华峰、凤凰山,〔城郭〕有中都新城、皇城的规制,〔国都〕有中都,〔宫室堂亭楼阁〕有宫殿、御书亭、鼓楼,钟楼,开国元勋阁,观星台,〔坛壝〕有圆丘、方丘、太社坛,〔公宇〕有广储仓,〔学校〕有中都国子监,〔军卫〕有中都留守司,〔寺院〕有大龙兴寺,〔祠庙〕有中都城隍庙、功臣庙,〔陵寝〕有皇陵、祖陵及扬王坟、徐王坟、十王四妃坟等等。其中如凤阳各个街坊的名称,皇陵的建筑规模,中都屯田的地亩、田粮、耕牛、桑枣细数等等,记载极为详尽。〔题咏〕中有不少赞美中都建筑、叙述祀祭皇陵的诗篇,〔文章〕中宋濂的《凤阳新铸大钟颂》是一篇保存至今的有关营建中都的最为生动具体的实况报道。这些记录为了解明初营建中都提供了确凿的资料。《中都志》又有洪武间撤中都宫室名材建大龙兴寺和天顺三年奏准撤皇城内中书省等衙门五百余间依式重建龙兴寺,以及宫殿“今遗址存”的记载,记录了中都建筑遭到破坏的情况;又有“中都留守司,故行大都督府也”,“凤阳府治,……即会同馆也”,“凤阳府学,……洪武甲戌(二十七年)以中都国子监为之”等等罢建中都后中都变迁的情况。〔文章〕中丘(濬)《凤阳府重修儒学记》等文还讲了营建中都、罢建中都、中都国子学的建筑和盛况。因此,《中都志》是明朝前期凤阳

中都的一部实录。

二是汇编了大量明初凤阳地区功臣和名人的碑铭。其中有中山王徐达，朱元璋的外祖扬王陈氏、岳父徐王马氏、滁阳王郭子兴，和沐英、邓愈、邓镇、常遇春、李文忠、吴良、吴祯、顾时、胡大海、赵德胜、寿州袁氏、郭英、花云、宋晟、宋国用、费聚、朱勇、孙岩、许亨、谢彦、沈仁等等大量开国功臣、名人的神道碑铭、庙碑、祭文、封诰，以及明初迁居临濠的郁新、柳耀等人的墓志铭、墓表等，一律全文照录。这些，都是了解元末农民战争，明初平定天下，以及明初迁徙江南豪族的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卷五〔人才〕又更广泛地撰写了这些人物的传记。因此，《中都志》又是有关朱元璋起义军及其取得政权前后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都志》还记载了古钟离、濠州及所属州县的历史、古迹等等。但对《通典》误以宋泰始二年(466)筑(小东)城以镇濠口为秦始皇二年，知其有异而未能正其误，又沿袭旧志之附会，仍误以为庄子墓在临淮开元寺后。

《中都志》原刊于弘治元年(1488)，书末有柳瑛后跋及刊字工师庐陵王珍、进贤吴环名录。卷首因有成化六年刘昌钦《中都志序》，李廷宝误以为“郡志刻于成化庚寅(六年)”。刘序是“成化中屡欲刊行而弗果”的证明，当时未尝刊刻。嘉靖辛亥(三十年，1551)有补刻本。李廷宝《跋中都志后》记述《中都志》因年久“字迹模糊，辄难认辨，又板缺三十余叶，殆不成书”，于是“命梓人于模糊者整之使明，遗缺者补之使完；又自甲辰(成化二十年)以来凡官师科贡前之所未及者，搜求而增入之。”隆庆己巳(三年，1569)又有重刻本。知府周汝德识：《中都志》“自嘉靖辛亥以后，旧版存者，十去五六”于是“命工重梓，特正其舛讹，补其残缺”。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有增补本。增补本除增补官师科贡外，最重要的是在卷首增补了地图。地图有《皇陵总图》、《府治总图》、凤阳府治和所属

十八州县的分图,后有“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凤阳县知县万嗣达增补”的题识。这些地图形象地反映了明中都的规划、布局和建筑状况,如完好的皇城,高入云霄的鼓楼、钟楼,高峙的中都九门,圜丘、方丘、各官署、留守司、各卫、龙兴寺、高墙、广储仓的位置,中都城的砌砖状况,皇陵、祖陵的雄伟规模,以及洪泽湖逐渐扩大,淮河水位日益提高,泗州、临淮半为水城的水文情况等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载,现仅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天一阁四处藏有《中都志》刻本,北图、南图、南大藏本我都看过,其中只有南京图书馆藏的缺卷一至卷四的残本四册是弘治原刊本。第一册第一页有“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八千卷楼藏书之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印,封面正中上端有“四库附存”印,左上角有“史”字印,余册仅有省图书馆印,很可能是编四库全书时进呈后退回的原残本。南京大学藏本是隆庆三年刻本,上有“金陵大学藏书之印”。北京图书馆藏本有是万历四十一年增补本,上有“京师图书馆藏书记”印。天一阁藏本虽未亲见,但据阮元《天一阁书目》〔史部·地理类〕及北图藏《天一阁重校书目》原稿删改本(并改名为《天一阁存见书目》)载:“《中都志》十卷,全”,有……“丰城周汝德后序”,民国排印《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劫余书目》又说明是“隆庆己巳刻本”。若有地图,则为万历刻本。因此,《联合目录》说四部藏书都是弘治元年刻本,记载不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三〔地理类存目〕二:“《中都志》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因此,天一阁藏本,即是进呈并退回的本子。几个不同版本中,以南图弘治原刻残本最为清晰,其余版本,字迹都有缺残不清,但有增补,万历本还有增补的地图,可以参看。

## 五、张良知《中都储志》十卷 存佚不明

北图藏康熙丁酉（五十六年）林佶传抄《天一阁书目》志部有“《中都储志》四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载北京图书馆藏有“（明）张良知纂修《中都储志》一十卷，明嘉靖间修，抄本”，但尚未在该馆查到卡片和原书。

## 六、杨鹄、顾承芳《临淮县志》二卷 佚

嘉庆十三年阮元刻《天一阁书目》卷二之二〔史部·地理类〕载：“凤阳府《临淮县志》二卷，刊本，有哦翠山房图章。○明嘉靖甲午（十三年，1534）邑人杨鹄、顾承芳纂辑，泉州知府凤阳高越序，浙江金华府推官张翼翔后序。”到光绪十五年薛福成刻《天一阁见存书目》、民国排印《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劫余书目》，均已不载此志，佚。

## 七、张云翔《凤阳县志》六卷 残存三卷

张云翔，河南上蔡人，万历六年以举人知凤阳县，节用爱人，实心为政。去之日，民悲泣遮道，不得行，《凤阳新书》《康熙凤阳府志》《乾隆凤阳县志》名宦均有传。

张云翔修、赵学之纂《凤阳县志》六卷，是凤阳最早的一部县志。韩宗德《凤阳县志后序》说，凤阳县原“无志”，“张公上承郡伯之命，莅任之始，他务未遑，日亲学宫，与学之赵先生督率一二生，讨求故典，裁成一书”。高以涵《凤阳县志后跋》说，他因熟知凤阳掌故，“邑志将成，贤侯张公虑其太略也，出以相示，予……遂应命

润色，庶成全书”。

乾隆修凤阳县志时，张云翔《凤阳县志》已“不可见”，今幸北京图书馆尚藏残存万历六年刊本三卷，但已不可得见全貌，也未见它书转载原序。卷四〔艺文〕数篇，内有嘉靖元年高越《谨题修复（中都）城池以固根本重地事》奏议一篇。卷五〔序记〕十数篇，嘉靖二十四年钱櫬《凤阳县钱令（楞）民恋碑记》记叙了明朝中期凤阳因“罗设八卫”，“漕、邮、祠署”，“中都留守”，都要“廩饩于斯”，以至“民贫入骨”，“土瘠不耕”，“逃歿殆尽”的悲惨情景。卷六为〔题咏〕。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载北京图书馆藏有张云翔赵学之《凤阳府志》六卷，万历六年本，存卷四至六。查考史料，张云翔并未修过府志，系《凤阳县志》之误。而张云翔《凤阳县志》则漏注“存卷四至六”。

## 八、万历《临淮县志》佚

康熙《临淮县志》、乾隆《凤阳县志》卷首转载欧阳灿《临淮县志序》，叙述：临淮原为汤沐邑，以附郭故，罢于奔命。贾应龙为临淮令，乞请免二十里外之附郭，除二百年因袭之害。“今之临淮，大非昔日之临淮矣，而《临淮志》则犹是昔也。”贾令迁升，邑之缙绅更修临淮志以志之。

或以为万历《临淮县志》即为欧阳灿所修，实系误会，不确。欧阳灿以举人授临淮教谕，与贾令同事数年。贾令迁京兆，欧阳已升调河南上蔡知县。万历三十六年春，摄令以更修《临淮县志》成，请为序，时欧阳已“去临淮二年有奇”，“未睹新志”，何来参与修纂。欧阳灿本人所撰临淮志旧序即可为证。

康熙修《临淮县志》，凡例云：“临淮旧志修于万历戊申（三十六



年,1608),迄今六十余年矣”;蒋其昌《重修临淮县志后序》说:“今所见者惟万历戊申本”。乾隆修《凤阳县志》,卷首转载欧阳灿《临淮县志序》;乾隆乙未(四十年)秦潮序:“临淮志始明邑教谕欧阳灿,康熙初邑令魏宗衡继作,……欧阳、魏(志)虽存,邑既归并……,”云云,故志尚存。至《光绪凤阳府志》〔艺文考·载籍〕,就不载此书,当佚于咸同之际。

### 九、万嗣达《凤阳县志》八卷 佚

万嗣达,江西德化籍德安人,万历四十年,由举人知凤阳县,勤于政事,志在保邨,条陈凤阳七弊,洞悉民间疾苦,有废必兴,治绩茂誉。任满,升兵马指挥。康熙《凤阳府志》、乾隆《凤阳县志》〔名宦〕有传。

《凤阳新书》卷八〔序〕,有万嗣达《重修凤阳县志序》及戴良材《重修县志后序》。乾隆《凤阳县志》卷首〔原序〕作:“明万嗣达《凤阳县志序》”。序中叙述修志经过:

县故无志。志创自今上御极之六年(按即张云翔《凤阳县志》),然亦自郡乘(按指《中都志》)中抽其汇帙,而稍加编缀,多所挂漏。夫郡(指凤阳府)纪十八国,事核辞要,籀籀龟鱼之属,男女畜扰之粗,不琐琐及也。矧今一纪而赢,其间易置,月异岁殊,观风者至无可征信。壬子(万历四十年)春,余令兹邑,取志翻阅,欲为厘校。……越二年,睹记稍习,质诸父老,记载互有异同。窃为中都高皇帝肇造之区,夙其天子而沐邑,埒之岐丰,可令无全书乎。乃檄学博程君文宸、林君懋修、暨诸生徐振民、盛世臣、罗于明、丁煜往复仇校,赘者删之,缺者补之,越岁乃始脱草。余与一二僚友,更为删定润泽而书成,凡八卷。……万历四十二年某月知凤阳县事浚阳万嗣达撰。

至乾隆修《凤阳县志》,〔凡例〕云:“今张、万之志不可见矣”;乾

隆三十六年孙维龙《凤阳县志原序》云：“张、万之志今皆不可见”；四十年秦潮《新修凤阳县志序》云：“张、万旧稿无存”。《光绪凤阳府志》卷十六上艺文考上载籍：“万嗣达《凤阳县志》，明万历四十二年修，未见”。故万志清时已佚。

## 十、袁文新《凤阳新书》八卷

袁文新，字又日，福建瓯宁人，万历四十七年由举人知凤阳县。康熙府志、乾隆县志〔名宦〕均有传。《明史·艺文志》作袁又新，误。

天启元年，袁文新《凤阳新书·自序》说：

风之志，张公（云翔）创之，万公（嗣达）饰之。……县为高皇帝汤沐邑，不可以凡属县例之，……于是厘旧志，仇讨成帙，题曰《凤阳新书》。……是书之成，余不佞总其事，……分其任（者）……凡二十有二人，各执一篇而录次引证焉。而余友柯子仲炯裁成之功居多。……八越月……而事成。

《凤阳新书》简称《凤书》，共八卷。卷首有详细的《凤书目录》和《中都内境山川、城池、陵寝、坟墓、第宅形势总图》。

卷之一，为高太祖皇帝本纪，徐达、汤和两世家。

卷之二，为列传，分叙国勋（开国功臣）、名宦、乡贤（刘继祖传尤为详尽）、列女（汪氏老母等）。

卷之三，为表五。其中〔制建表〕比《中都志》更为详备地记载了明中都各项建筑的制度、规模，还叙述了天顺后兴建的禁锢宗室的高墙。

卷之四、五，为内篇八。〔赋役篇〕叙述凤阳户口有编民、土民之别。编民为“国初调江南之十有四万以实中都者”，“初皆无有五宅三居之志，父母坟墓不在焉，妻子不至焉，田宅未开焉，此其必通

之势也。是以今天下二百六十余年，而凤户耗者十之七，计口耗者十之九。苟民逋而征存，则户存者赋重，口在者役烦，此又其必散之势也”。土民指太平乡八里和祠祭署户二十家。土民名为“汤沐遗黎”，“全免粮差”，实则祠祭署照样征赋以供陵祭之需，“而陵祭署之差，十羊九牧，朘削者更多，亦折而入于流徙”。〔星土篇〕记载了凤阳“十年九荒”的情况。〔赋役篇〕里还叙述了凤阳谒陵、文宴武试、修葺公署、释归高墙庶人、舆夫等等沉重的差役，详细列举了里甲旧派新增共达九十八项派办银两的名目和细数。〔国费篇〕叙述了凤阳人民对万历起每三年在凤阳举办江北四府三州历时七十天的文武乡试的供役之费，谓之“三年一剥皮”。〔宗祀篇〕载录了朱元璋在中都圜丘带罪告祀天地地原文；详细地叙述了皇陵、十王四妃坟的历史、建筑等等。

卷之六至八，为外篇九，汇载了大量有关明中都的文献和艺术文。奏议中收入了嘉靖四十四年知府王应璧纂辑的有关修中都城的奏疏和他的原跋，为了解明朝中后期凤阳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书帖中具体生动地叙述了凤阳差役烦重，人民逃散，土地荒芜的状况，说：“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杠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而未止，而又为纤夫矣，……民奔走之不暇，何暇耕乎？”以至民“逋者八九，存者一二”，地“荒者十九，耕者十一”。

《凤阳新书》是记叙明初营建中都、中都的变迁、中期以后以土瘠差重、人民大量逃亡等资料最为完备的一部方志。但匆匆成于众手，随刊随增，目录与内容不尽相符；体例非常，材料参差排比，查检不易；又如〔拾遗篇〕对古钟离、临濠位置的考订，对古有东西两城的解释，对钟离“以东有钟乳(山)，西有离山，故名”的解释，全属主观臆断；〔制建表〕所记皇城、里城高度与《实录》记载不相符合，皇城长度也与实际不一致(如按元制120丈为一里则相符)。同《中都志》审慎、谨严相较，《凤阳新书》往往随心所止，适成对比。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藏的天启元年原刊本，上有“杭州王氏九峰书庐藏书之章”，纸色稍呈赭色，印刷清晰。北京图书馆藏本原缺扉页、李枝秀《凤阳新书序》及袁文新《自序》前半，图象不清晰，版页四角字迹模糊，系重印本，上有“南陵徐氏”“四明庐氏抱经楼藏书印”“伯邻所藏善本方志”“吴兴徐氏”“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北京图书馆藏”等印。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现上海图书馆及辞书社也藏有此书，但尚未亲见。

### 十一、魏宗衡《临淮县志》八卷

魏宗衡，江西广昌人，康熙九年由进士任临淮知县。卷首康熙壬子（十一年，1672）临淮县令魏宗衡《临淮县志序》：“是役也，择诸弟子员文行端方数人于通真观中纂修，恪遵省志，无一摭惑浮词，以负搜采，凡两月而竣，爰书数言于简端，以志厥成。”明言纂修者为“诸弟子员数人”，而卷首刊“临淮县修志姓氏”，编纂为原任临淮县儒学教谕邢仕诚、原任临淮县儒学训导杨惟一、原任河南睢州学正黄继芳、原任山东高唐州知州许守仁（邑人）、原任广东定安县知县卞献璘（邑人）；而临淮知县魏宗衡自列为“校阅”。康熙《临淮县志》除许守仁有《临淮县志凡例》、卞献璘有《邑志跋》外，邢仕诚、杨惟一、黄继芳均无序跋。考乾隆《凤阳县志》卷五《经制·职官》上：原临淮县儒学教谕有“邢士诚，直隶高淳人，贡生，万历三十五年任”，而《临淮县志》凡例说：“临淮旧志修于万历戊申，迄今六十余年矣”，蒋其昌《重修临淮县志后序》：“今所见者惟万历戊申本”。戊申为三十六年，即邢仕诚任临淮教谕的第二年，如尚健在，至少也有九十上下，但序中均未提及，因此，邢仕诚很可能是万历《临淮县志》的编纂人，因系“重修”，仍保留原编纂人姓氏，与卷首仍刊万历戊申欧阳灿《修临淮志旧序》同一意思。乾隆《凤阳县志》孙维龙

序、于万培序均作“临淮志修于康熙十一年知县魏宗衡”，秦潮序作魏宗衡继作，凡例作魏宗衡重修，均不提及邢仕诚。因此，主修实为魏宗衡，自序及修志姓氏不提及本人名，实出于本人的谦逊。《光绪凤阳府志》〔艺文考上·载籍〕作“魏宗衡《临淮县志》，康熙十一年修，未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作魏宗衡、邢仕诚纂修；南京图书馆目录按卷首“修志姓氏”作邢仕诚，当有误。

康熙《临淮县志》承前志纪述濠州“初为东西二城”，“宋连南夫作守，谓二城非便，乃决濠水于城西经达于淮，合二城为一矣”。

康熙《临淮县志》突出地纪录了淮水浸城的严重现象。〔祥异〕纪录了永乐四年至康熙七年间的“大水灌城”十四次，顺治四年五月，“淮水冲城，官衙、学宫、民舍尽为漂没，……全城止存西南两隅如小洲然，东北仅露城垛口”；〔城池〕记载了淮水泛涨，冲倒城墙，“迩来淮水逼浸城下，为患更甚”；〔河防〕记载了“频年水涨城下，浸者三版，官民不遑宁居”；〔艺文〕载魏宗衡《新建临淮儒学记》，云“临之城周九里，水居强半”；《临淮县治图》画了城池和“市河”，《图考》云：“迩罹河伯叠虐，极目汪洋，半为泽国”。“市河”当即是原濠水下游故道。同时又零星地反映了淮河河床淤填升高的现象；〔城池〕记载了嘉靖中淮水大溢，东北城门移风门“以淤塞废”；〔关津、桥梁〕载“广运桥，涂山门（临淮城西门）外，洪武三年造，……屡为淮水冲颓，……今水淤成市矣”。

卷七〔艺文〕载录贾应龙《改免附郭条议详允始末》与《驿递申文》，具体叙述了临淮二十里附郭各种徭役的烦重和濠梁驿当水陆要冲，以至“夫亡马倒，十室九空”的状况，为明朝后期凤阳人民的悲惨生活提供了真实的写照。

南京图书馆藏的原刊本颇为清晰。北京图书馆藏本印刷稍差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复旦大学亦藏此志，未亲见。

## 十二、耿继志《凤阳府志》四十卷

凤阳自明成化修《中都志》后，二百多年来仅嘉靖、隆庆、万历时作过一些增补。明亡以后，以汤沐中都“侈明代兴王之隆”的旧志，已不适于时代要求，应按一般府志体系重修改编，但他郡可因者多、可革者少为难，又兵焚之后，典籍荡轶，文献无征。康熙十一年，顺天宛平籍、浙江富阳人章钦文由监贡任凤阳知府，毅然以创修府志为己任，勤奋修纂，“而缮辑维艰，残缺未备”，十四年，以升迁“终未成编”。十八年，盛京盖平人耿继志（字中敏）由荫生任凤阳知府，奉檄征取府志，“第借手于章公之创始，”“仓卒成编，录送志局，聊应一时之命”，遂慨然“留意前太守未竟之渚”，“采邑乘，购遗编，核实考详，删繁就简”，“欲垂亿万年不朽之书”。“乙丑（二十四年）春，复奉部檄取，未敢以洼漏草率之编进”，乃“设局重编”，请凤阳学府教授江南宜兴人汤原振、凤阳县学训导江南丹徒人张昊“重加厘订”，于是“搜集旧闻，网罗近事，芟除纰缪，辨订豕鱼，不二月而告终”。康熙修志本末，见耿继志《凤阳府志序》及汤原振、张昊两跋。

康熙《凤阳府志》是一部谨严、完备，修得比较好的方志，其中对明末清初凤阳地方的情况纪录得尤为详尽。

（一）卷三十五〔艺文〕一载尹端《郡守颜容宣殉节诗》和《挽留守朱国相殉节诗》两篇纪事诗，详细叙述了崇祯八年农民军攻占凤阳的经过，生动具体地反映了明末农民起义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形象以及明朝的统治腐败，将吏无能；蔡方炳《旧陵行》长诗纪录了官府无能和严重破坏皇陵古建筑群的实况。诗里说：“连岁年饥不得活，有司无策救奇荒，许搬木石供粗粝，上则翻殿瓦，下则移门闕，柱梁一旦摧，台沼无留馥。吁嗟乎！救荒奇策古所无，有司

有司真良谟！”这又是对皇陵“尽遭”农民军“焚毁”，“荡然一空”的污蔑之词的有力驳斥。

(二)〔城池〕〔公署〕〔祠祀〕〔古迹〕〔寺观〕等部分记叙了明末清初中都建筑遭到破坏和变迁的状况；还记载了崇祯八年“守监王裕民以流寇犯凤，奏请凤无城郭，客民避难，因而结茅其中，居民日密”，康熙元年建永泰仓于废皇城内，和康熙六年奉旨移凤阳县治于旧皇城内的事实。

(三)卷三十七〔艺文〕三章钦文、耿继志两篇引记述了康熙初凤阳地瘠民贫的状况；卷四十耿继志《祭八腊庙文》说：“流离之状，所在多有，其尤甚者，无如兹土之人，……民之逃死于四方者，往往离乡井，历冬春。”

(四)卷三十九〔艺文〕五载明常三省几篇议泗州水患的文章；卷八〔水利·泗州〕又叙述了明朝后期起淮水为患的原因是下流清口为黄河含沙沉淀淤塞，散入射阳、白马、草子、高、宝等湖排淮入江之道又尽筑堤防阻塞，“自是清沙日高，淮水益壅”，而为大病。

(五)〔艺文〕中保存了大量凤阳地区的文献资料；卷一〔图考〕绘制了凤阳府及所属十八州县的地图。如《凤阳县图》上，明中都三道城墙均在，皇城已作为凤阳县治，钟楼仅存台基，皇陵已成“旧陵”，《临淮县图》上城墙、浮桥均在等等，这些都真实形象地保存了康熙初期凤阳地区的面貌，极为珍贵。

《光绪凤阳府志·叙录》：“(冯)煦奉命来守郡，在京师即周咨淮甸事，无籍考求。及下车询于荐绅先生，金曰：明柳瑛《中都志》、袁文新《凤阳新书》外，《康熙府志》久佚，同治间修省志，并未见旧本。……于书将成时，在金陵书肆购得康熙〔二十〕四年旧郡志本”；〔艺文·载籍〕亦记“同治间修《安徽通志》，凤阳各属州县志皆未见此书。今始访得之”。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初稿)，现仅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科

学院图书馆藏有康熙《凤阳府志》。北图藏本为原刊本，印刷清晰，但缺卷十三、十四职官一、二两卷，存三十八卷，其中卷二十九至三十四计六卷系用别本抄配。科图藏本四十卷全，有少量缺页钞补，但书版有朽蚀剥落，边角字迹缺损模糊，纸张、印刷均差，未见有增补及跋，当是重印本，印刷年代不详。

### 十三、孙维龙、于万培《凤阳县志》十六卷

孙维龙，顺天宛平人，乾隆三十一年调任凤阳知县。在任五年，修《凤阳县志》，“为志五、为门三十四，为卷一十六”，并请钱大昕为之序。乾隆三十七年，知县于万培复加修订，于四十年（1775）刊版。

乾隆《凤阳县志》各门均有小序，提示要旨，梗概了然。全志眉目清楚，叙事清晰，是修得最有法度、最有水平的一部凤阳方志。乾隆《凤阳县志》纪录了撤旧明中都皇城建凤阳府城、临淮城已成为“积水之区”等康熙修《凤阳府志》以后凤阳一百多年间的变化。

光绪二年（1876）重刊本，质量远不如原刊本优美。因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不复赘述。

### 十四、谢永泰《凤阳县续志》十六卷

同治十三年凤阳知县谢永泰续修，分门附于光绪二年《凤阳县志》重刊本之后。其中以记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过境及咸丰、同治中捻军攻占并据守临淮和凤阳府县两城事，最为详尽。

### 十五、冯煦《光绪凤阳府志》二十一卷

光绪二十一年，冯煦任凤阳知府。明年，设局重修府志。阅六年而告成。因兵火之后，旧志均已散佚，实无异于新编。光绪三十



四年(1908)聚珍版(即活字)排印,错别字极多,各大图书馆均有收藏,亦不多述。

## 十六、易季和《凤阳县志略》一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凤阳县长易季和修,铅字排印,线装一册,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收藏。志略记录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凤阳(包括蚌埠)的行政、经济、文化情况。〔交通·陆道〕载:“昔通驿站,北起王庄驿,南行五十里至临淮镇,又南六十里至红心驿,昔为东南九省通衢,临淮实居中心,为自古用兵要地。自平浦路(北平至浦口)成,形势一变,蚌埠因为(位)平浦路南段中枢,一跃而为重镇,直取临淮昔年之地位而代之。”

## 十七、《新修凤阳县志》三卷

中国共产党凤阳县委编纂修志委员会编,1960年打字油印本。这是解放后编纂的一部方志,全面纪载了凤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对解放前凤阳党组织的活动和凤阳山区武装斗争的情况,记载尤为详尽。

方志是“以一方之人修一方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如《中都志》《凤阳新书》纪明初营建中都、修建皇陵,叙明代凤阳“兴王之隆”和盛衰变迁;康熙《临淮县志》载县令贾应龙《改免附郭条议详见始末》《驿递申文》两文,最为具体生动地申述了明朝中期以后凤阳差徭烦重、人民逃亡的悲惨情况;康熙《凤阳府志》载尹端纪事诗对明末农民军攻占凤阳情状的详细描述,蔡方炳《旧陵行》对地方官员许以拆毁皇陵建筑为“救荒奇策”的叙述和讥评;

《临淮县志》凤阳方志和不同时期的古地图上对明中期以后淮水为患的图文纪录；《凤阳县续志》对太平军北伐过境和捻军斗争的纪事等等，都是极为珍贵，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可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因此，查阅方志，如同拿了放大镜甚至显微镜用微观的方法来进行观察，成为了解历史情况、搜集历史资料必不可少的一种重要手段。

可是，方志缺失的现象十分严重，翻检张国涂《中国古方志考》，元以前的方志，包括总志和辑佚书在内，存者百无一二；明代方志仅著录于《明史·艺文志》的，到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书），大都不再重见，已经散佚，即幸存的，大多也成了海内珍本、孤本。乾隆重修《凤阳县志》时，万历中张云翔、万嗣达修的两部《凤阳县志》均已“无存”；同治时修《安徽通志》和凤阳所属各州县志时，都找不到康熙《凤阳府志》，以为“久佚”；光绪重修《凤阳府志》时，康熙《凤阳府志》、《临淮县志》、乾隆《凤阳县志》原刻全本也都找不到了。现在凤阳方志除了光绪重刻的《凤阳县志附续志》和《光绪凤阳府志》外，很多已佚，幸存于世的都已成为珍本分藏于几处大图书馆，查阅不易，各本互有增、配、残、损，难以逐一比较，而且我们也不能作这样的保证，说以后方志绝不会再遭损毁散失了。因此，为了保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真正保证不再在我们手中继续散失，并使它能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所利用，我认为要求国家拨一笔专款，组织力量，把幸存于世的方志缀合成为完善的版本，予以影印，广为流传是值得的。现在什么古书都要标点重排我看是没有必要的；印什么书都要看有没有利润也是不对的。图书出版工作是事业，并不是商业，化些钱把严重散失流程中幸存下来的方志较快地统统影印出来，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子孙后代的一种贡献。我写本文的目的，也是想借对凤阳一地方志的具体叙述和考证，作一些呼吁。